

新加坡年轻指挥家黄佳俊

本报讯（本报特聘记者 小玉 采访报道）新加坡年轻有才华的指挥家黄佳俊在去年8月底的布加勒斯特第4届国际年轻指挥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同时，“乔治·埃内斯库”国家音乐团邀请他来指挥今年5月底的音乐会，曲目包括：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的序曲；李斯特第1号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5号交响曲。

黄佳俊近几年来数次参加重要的指挥竞赛并获奖，如2011年克罗地亚“洛夫罗·冯·马塔契奇”及2013年我国“乔治·埃内斯库”交响乐国际指挥竞赛。他曾在2012年获得“李光耀”奖学金在柏林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在2011年和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音乐节上他担任了罗伯特·斯帕诺指挥家的助手指挥。他也参加了另外一些著名指挥家的“指挥大师课程”：伯纳德·海廷克、佩卡·约瑟夫、约玛·帕努拉或是尤里·西蒙诺夫。他的导师是库特·马祖尔，从2012年至2014年期间从师于这位导师，这样有机会指挥莱比锡交响乐团、波罗的海“年轻”交响乐团、曼哈顿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以及东京“洗足学园”交响乐团。这些合作的高峰是，被马祖尔大

师邀请在2013年9月份莱比锡市著名的“杰万”交响乐团作为他的助手指挥。黄佳俊热心促进新音乐，指挥香港“新音乐”交响乐团，在2014年在国际巡回演出时，参加北京新音乐节、泰国国际作曲节以及越南-欧洲当代音乐节。在2014年至2015年的演出季节，黄佳俊将与布加勒斯特、克拉约瓦市、布拉索夫市和锡比乌市的交响乐团合作主持音乐会。

他此次来罗指挥音乐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同时也抽出时间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当问到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时，他回答说：“我在儿童时代，7岁时（就）同小学音乐队合作演奏小号。”之后从演奏乐器选择了踏上指挥的道路。黄佳俊说：“我17岁时开始作曲，而我作的曲要自己指挥。我逐渐对领域感到兴趣，对舞台工作（感到）兴奋。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新加坡“杨秀桃”音乐学院，在这里研读了4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德国柏林市“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我

在柏林留学时期过得很充实，因为除了上课以外，差不多每天都参加“柏林交响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或是“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排练，这样就有了机会观看世界上最有名的指挥家工作，同时看见他们与交响乐团合作所能获得的结果。这对一个年轻指挥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接下来我问黄佳俊在参加去年第4届国际年轻指挥家比赛以及上大师课的学习上有什么收获，他回答说：“去年报名上指挥大师课程很打动我，也帮助了我好好准备一周后的竞赛。我同两位著名指挥家和教授学习，他们是芬兰的约玛·帕努拉和奥地利的王进大师。他们两位是很好的教师及交响乐团领导人。他们的讲课帮助我敞开了想象力、尤其使我更多了解指挥同交响乐团合作排练的主客观环境。我不仅仅享受了用手指指挥的美好机会，而且懂得乐曲的结构和走向，来学习为交响乐团的声选择最适合抒

情的节奏。随着两位教师的指导和解释，我们能了解交响乐团的心理及排练的准备以便在正式音乐会中获得最佳效果。”

接下来我请黄佳俊谈谈这次在国际竞赛上获得一等奖能否对他的艺术生涯敞开新的机遇，他回答说：“获得一等奖后，不少著名交响乐团邀请我合作，如：美国亚特兰大交响乐团、德国柏林市管弦乐团、罗马尼亚“皇家”交响乐团、阿根廷圣达菲市交响乐团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交响乐团。本周有机会再度来到布加勒斯特，为我的音乐会作“乔治·埃内斯库”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会后我被该机构的艺术经理兼钢琴家尼古拉·李卡勒茨再次邀请明年来此指挥柴可夫斯基第6号交响曲。这一消息使我感到高兴。”

这次音乐会的曲目虽然难但是很美，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问到黄佳俊与罗马尼亚交响乐团合作后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他回答说：““乔治·埃内斯库”交响

乐团是罗马尼亚国家第一流交响乐团，有潜力同欧洲最有名的交响乐团比较，如柏林、巴黎或是伦敦市交响乐团。我对交响乐团弦乐部分丰富的声音、木管独奏的声音和铜管乐器的统一声音印象非常深刻。这一交响乐团的历史悠久并且重要，我感到很荣幸和谦卑有机会和他们合作，因为我是和他们工作的最年轻指挥。”

黄佳俊为5月间的音乐会第三次来到罗马尼亚。虽然每次来只停留几天，我问他他对罗马尼亚的印象是什么。他指出：“罗马尼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布加勒斯特我最喜欢的地区是市中心以及“乔治·埃内斯库”交响乐音乐厅的位置。可能这是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大多数时间，也因着音乐厅这一历史性建筑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其美丽建筑风格。周围有不少咖啡馆和小饭店。我回想起来，去年参加比赛之前，从上午到晚上在音乐厅后面的一家小咖啡馆学习，准备竞赛，因为我住宿的小旅馆没有桌子以及好的灯光允许我学习。所以本周上午我抽空再次返回去这家咖啡馆喝杯味道浓郁的咖啡，回想起来去年的美好时光。”（完）

黔川行随笔之一写了巴中农村。在那里，民间社会长期积贫积弱，孤苦无助，红色政权作为“穷人救星”反哺社会，以全责政府的形式展开大规模的救助，到处兑现“一夜跨千年”式的发展，红色政权本身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历史逻辑自洽，获得了充分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总体上，中国政府对贫弱社会的救助是极为成功的。据联合国统计，按每天每人1美元的最低标准计，近三十多年来，有多达4亿的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

但巨大的中国几乎就是欧洲与非洲之和，除了贫弱社会，也有富强社会。在很多原本就较为富裕的地方，一些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红色国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诱导，他们信奉另一套历史逻辑：当年的“发财人”原本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创造出社会繁荣，国家也会随之富强，但红色政权的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进程，经过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失败试验，终于改弦易辙，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然而红色政权本性难移，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经常发生国进民退的反改革，所以当务之急是继续逼迫政府退缩，继续推动国退民进，一直回到当年红军立场的对立面。

为什么会有相互对立的两套历史逻辑呢？为什么一些人相信只有国进才有民进，另一些人却坚持说只有国退才有民进呢？

很显然，此“民”非彼“民”，大力鼓吹国退民进的这些人，并不代表巴中农村这样的贫弱社会，所说的“民”当然也不是以“父亲”为代表穷苦阶层，恰恰相反，正是“父亲”们的对立面“发财人”。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民国家，所有国民无论贫富都称作人民，当今的新富人、新贵族甚至新寡头，在政治概念上也都是人民，于是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将社会中的贫与富的对立转化成了国与民的对立，通过“国退民进”这个貌似正义的大旗，掩护富人向国家的争利，鼓动私权向公权争权。所以，确切说，这些人要的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退私权进、国退寡头进。

国退私权进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贵州省仁怀市，当地经济发展正好提供了一个微观实例。

仁怀市下辖的茅台镇因闻名世

茅台镇上的国进民进

——黔川行随笔之二

■旅罗华商 文 杨



茅台镇一角



仁怀市长王茂才介绍市情

界的茅台酒而得名，建国前最著名的三家烧房恒兴、成义、荣和于1952年被政府没收和并购，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从此以后，茅台酒就是国家的，酒厂的利税上缴国家。

关于茅台酒，一直都有着“茅台酒神奇密码不可复制”、“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的信条，也就是说，茅台酒实际上是仁怀市茅台河谷这一地理区域的产物，没有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土壤成分，也就没有茅台酒，这个关系谁都无法否认。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茅台酒厂上游100公里内，不能建工矿企业和化工厂。这就是一个标志，国家提供对整个地理环境和酿造工艺的保护，同时也提供了对茅台酒生存和发展的保障。1974年曾有正式的“易地茅台”试验，但没有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茅台酒与茅台河谷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茅台酒也一直被称为“国酒”，正是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以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并向外国宾客广为推荐，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不容挑战的国家级品牌。

赤水河是国家的，茅台河谷是国家，品牌是国家的，酒厂也是国家的，红色政权建国的现实结果，这本来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随着中国白酒市场的急速膨胀，茅台镇上的非公酒业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据统计，目前茅台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厂，已两千多家，“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酿酒”，而仅2011年注入到仁怀山沟里的资金就超过了400亿元，是政府财政收入3倍。现任仁怀市市长王茂才在介绍情况时反复使用了“社会资本疯狂涌入”来描述前几年的情况。

所有这些酒厂生产的有品牌的酒，统称“茅台镇酒”，与国营的茅台酒共用同一条河的水，共享同一个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也同样“提梁之精，取麦之魂，采古酿技术，得山川灵气”。但是，不同的是，它们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负责保护，利用茅台品牌而不负责维护，利用基础设施而不负责建设，利用城镇条件而不负责规划。一位进行了实地采访的记者写道：“…现场令人震撼。超过400亿的资金涌入后，这个曾经十分偏僻的大山沟，完全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数平方公里的大山沟里，数十个酒厂同时动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厂房、办公楼

已拔地而起。工程车来回穿梭，扬起的尘土，让这里的天空一片灰蒙。”

面对这种形势，国家还应该继续退让吗？政府还能只做“守夜人”吗？即使不按红色政权的逻辑，就按自由市场的逻辑，仅仅赤水河的水质保护和茅台山谷的环境保护这至关重要的两项，能靠充分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自动解决吗？

在这里，社会已不属于贫弱社会，当社会资本总额高于政府财政收入数倍甚至更高时，社会力量就已强大到政府能做什么它们也能做什么，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在这些地方，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遇到最大的挑战，那些最大的土豪无时不在幻想着：如果政府彻底实行放任，国家完全退到角落，那么，整个茅台镇就成了…

这种幻想并非白日梦。就在本月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布，墨西哥的美洲电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又超过了比尔·盖茨，再度成为

全球首富。他的个人净资产接近800亿美元，比两个巴拿马还多，相当于4个南宁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资本家的标杆和楷模，代表着寡头对于国家的最大限度的胜利。

除了“最大寡头”，“最小政府”在当今世界上也有实例，那就是索马里。那里见不到法庭和警察，但也见不到新建公路和桥梁；普通人可以自由地随意拥有步枪甚至坦克和导弹，但其实他们除了靠自己保卫自己别无选择。

中国这个国家可以出比尔·盖茨和斯利姆·埃卢吗？可以为了自由市场而牺牲政府威权和社会制度吗？也许，真到了茅台镇乃至仁怀市都重新落入寡头们手中的那一天，人们才终于明白，正是当年红色政权的建立，才免于让中国成为索马里。

红色政权的建立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新的发展模式叫“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人们看到，正好借助了从去年开始的白酒市场大退潮，仁怀市和茅台镇政府再次拿出积极有为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转型。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仁怀市“正立足‘五位一体’建设茅台示范镇，概算投入256亿元实施‘环境整治、产业壮大、交通疏解、旅游开发’四大工程”，立志要将茅台镇打造成“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镇。

经历了数次进进退退的大起伏之后，在这个山沟城市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博弈还将继续上演，政府与民间的楚河汉界还将不断变更，只要茅台河谷继续神秘，酱香白酒仍然醉人，社会资本就会疯狂起舞，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也还将接受新的检验。但可以肯定，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墨西哥或索马里。中国就是中国，古人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4年7月23日



笔者参观茅台集团